

隋唐丁中制探源

——從敦煌吐魯番出土戶籍文書切入

徐 暢

提要：正史中首次明確記載的丁中制是西晉武帝平吳後“戶調之式”的“丁中老小”劃分，而最為完整的“黃小中丁老”之制，傳統認為形成於隋朝。據傳世史書的記載，我們只能了解丁中制發展中的幾個關鍵點，而借助敦煌吐魯番新舊出土的戶籍類文書，即可發現晉以降的丁中制在十六國、北朝等不同時段的發展脈絡。西晉制度向隋唐演進之主流，在北朝而不在南朝。北魏、北齊，尤其是北周實現富國強兵的一系列經濟措施中包含了對戶籍法與丁中制的變革，從而直接促成了“黃小中丁老”制度的誕生，並為隋唐所繼承。

關鍵詞：丁中制 戶籍 十六國 南朝 北朝 隋唐

丁中制是中國古代為徵派賦役而將編戶人口按照年齡進行劃分的制度，^①即賦予不同的年齡組別以不同的年齡稱謂，並將其與賦、役緊密聯繫。大約在春秋戰國之際，民衆開始成為賦役徵派的

① 參考《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 I》“丁中”條（孫曉林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頁174—175。

主要對象。不過戰國秦漢時,年齡並不是徵發課役的惟一依據,同時還有身高、爵制等因素。在二十等爵制廢弛後,年齡方成為賦役的決定因素,丁中組別成為國家控制人口的核心環節而被寫入戶籍。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實行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的兩稅法以後,其影響纔逐漸削弱。

正史中首次明確記載的丁中制,是西晉太康元年(280)晉武帝平吳後的戶調之式“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①從記錄歷代戶口、丁中沿革的《通典·食貨典》及《通志·食貨略》中,我們得以大體窺見丁中制發展之脈絡,但二書所引,亦皆正史所提示的幾個關鍵點:漢景帝男子二十傳籍,西晉武帝戶調之式,宋丁中新制,北齊河清三年(564)令文,隋唐黃小丁中老之制。^②這些斷斷續續的時間點,難以聯動成線,不能明晰地揭示丁中制之衍生源流。可喜的是,近年來,一系列與戶籍相關的簡牘被先後發現並予以公佈,^③其中保留的年齡稱謂記錄,尤其為探討晉

①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790。

② 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七《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丁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54—155;《通志》卷六一《食貨略》“丁中”條,萬有文庫本,頁741上—中。

③ 如湘西里耶出土秦代戶版,荊州松柏漢墓出土的約漢武帝初年戶籍類木牘(48號、53號),安徽天長安樂鎮紀莊村漢墓出土的漢武帝時“算簿”、“戶口名簿”,長沙東牌樓出土東漢靈帝建寧四年(171)前後戶籍簡,長沙走馬樓吳簡戶籍簡等。參考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張榮強《湖南里耶所出“秦代遷陵縣南陽里戶版”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頁68—80;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4期,頁24—32;天長市文物管理所、天長市博物館《安徽天長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1期,頁4—21;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釋文校訂稿》,《簡帛研究》200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62。王素先生對上述戶籍實物材料的出土、公佈、收藏情況作了簡單介紹,參考其為張榮強《漢唐籍帳制度研究》一書所作《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以前之丁中制提供了極好的條件。^①

目前研究以爲,秦漢時期丁中制設計很粗糙,僅有“大”與“小”的戶籍身份,傅籍、皖老、免老等課役身份附麗於爵制,在戶籍中基本沒有對應的稱謂;而根據走馬樓戶籍簡提供的情況,三國時期,孫吳戶籍中開始出現與賦役徵派相關的戶籍身份“老”、“丁”。晉武帝平吳後,主要綜合秦漢傳統和魏制,頒佈了戶調之式,爲不同的課役身份創立了“丁”、“次丁”、“老”、“小”等含義明確的指代詞彙,戶籍身份漸與賦役徵派嚴密結合,從而衍生出齊整的丁中老小制,^②現將漢晉間丁中制之演變列表如下:

表 一

單位: 歲

漢	小		大			
	未使	使	未傅大男	傅籍	皖老	免老
	1—6	7—14	15—22	23—55	56—59	60 以上
曹魏/孫吳	小		服役			老
	1—12		13—70 以上?			70 以上?

- ① 已有衆多學者借助新材料關注年齡管理與丁中等問題,僅列舉一些代表性成果:張榮強《〈二年律令〉與漢代課役身份》,《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25—41;《孫吳簡中的戶籍文書》,《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3—20,收入氏著《漢唐籍帳制度研究》,頁37—66,89—122;王子今《兩漢社會的“小男”“小女”》,《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頁39—45;趙龍亮《秦漢年齡分層與相關問題考察》,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08年。
- ② 凌文超借助簡牘戶籍材料,系統梳理了由先秦至魏晉丁中制衍生的脈絡,由漢制到晉制轉折的關鍵點是走馬樓吳簡所反映的孫吳戶籍與丁中之制。本部分對晉以前丁中制之回顧,採用其研究成果,見所撰《秦漢魏晉“丁中制”之衍生》,《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頁25—45。

(續表)

西晉	小	次丁	正丁	次丁	老
	1—12	13—15	16—60	61—65	66 以上

注：漢代指西漢後期到東漢制度，因傳籍、皖老、免老年齡在西漢前期屢有變化；高敏據《三國志·魏書》所載王《令》推測了曹魏丁中制，參考其主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32—533；孫吳的情況來自吳簡中提供的材料。

晉制固然是丁中制發展演變中的一個關鍵點，但與隋唐“黃小中丁老”之制相比，尚有很大不同。一是並未正式出現“中”、“中男”之稱謂，晉之“次丁”，包括成丁前（13—15歲）及入老前（61—65歲）兩個階段，^①而隋唐之“中”僅指成丁前的年齡段。“中”的真實含義沒有得到落實，“中”在何時出現，老“次丁”何時消失，從均田制下授田與課役來講，“中男”階層的出現有何實際意義？對此，前輩學者鮮有論及。^②

二是“黃小中丁老”之制，傳世史書記載始於隋開皇二年（582）文帝頒佈新令：“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小，十七已下為中，十八已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據此古人多以為始自隋唐。^③在今人中亦有類似看法，如孫曉林先生認為，隋朝除承襲北齊“丁中老小”之制外，在“小”下新增“黃”，從而形成

-
- ① 大約與西晉戶調之式同時的郴州晉簡中，有對男子按年齡13—15歲進行統計的簡例，但並沒有出現“次丁”或“中”之稱謂。此承凌文超提示。
- ② 高敏先生利用傳世及出土戶籍文書探討了十六國、北朝以及南朝的“丁中老小”制度，但他在分析時，將“次丁”與“中男”的含義完全混同，並認為從十六國到北朝，次丁入老前的階段一直存在，只是年齡有所調整。見其主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34—539，560—569。
- ③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680。前述《通典》、《通志》，及宋葉廷珪撰《海錄碎事》卷八上《聖賢人事部中》“黃小中丁”條（上海辭書出版社影印，1989年，頁210上），皆引《隋書·食貨志》材料，以此制源於隋朝。

了完整的丁中之制。^①而敦煌文書“西魏大統十三年(547)瓜州效穀郡?計帳”(S. 613V)^②對家口的丁中記錄,已有“黃男”、“黃女”等字樣。1954年日本學者山本達郎對該文書進行介紹時,已對其中的丁中制進行了總結。^③此後國內學者王永興、唐耕耦、楊際平等先生相繼關注和討論了此計帳文書的若干問題,^④注意到其中的丁黃之制,但並未強調“黃”作為丁中稱謂,首次出現在戶籍記錄中的意義。鄧文寬先生還比較了文書中所載丁中劃分,尤其是成丁年齡與正史《食貨志》所載北魏、北齊以及隋初制度的差異,條列了北朝丁中制變化的表格。但由於“黃”、“小”、“中”與田制、賦役關係不大,暫置之未論。^⑤

本文擬以晉以降,十六國、南北朝這一較長時段的歷史變遷為背景,探討作為一項具體制度之丁中制的發展變化。由於丁中制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 I》“丁中”條,頁174—175。

② 《英藏敦煌文獻》(2),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78下—85上;又見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22。

③ 山本達郎《敦煌發現計帳式文書殘簡》(上)、(下),《東洋學報》第37卷第2、3期,1954年,頁1—60,83—98。譚兩宜譯《敦煌發現計帳式的文書殘簡——大英博物館所藏斯坦因帶來的漢文文書六一三號(上)、(下)》,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4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81年。

④ 王永興《介紹敦煌文書西魏大統十三年的計帳戶籍殘卷》,王仲華主編《歷史論叢》(2),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頁245—273。初稿寫於20世紀60年代,主要討論了文書修造的時間、文書所記的均田制與租調制,以及“蕩寇將軍”、“臺資”、“六丁兵”、“虞候”等專有名詞的含義。後收入氏著《陳門問學叢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56—281,略有改訂;唐耕耦《西魏敦煌計帳文書以及若干有關問題》,《文史》第9輯,1980年。收入沙知、孔祥星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49—79;楊際平《關於西魏大統十三年敦煌計帳戶籍文書的幾個問題》,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頁404—428。

⑤ 鄧文寬《北魏末年修改地、賦、戶令內容的復原與研究——以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為線索》,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出土文獻研究》(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263—276。

與戶籍、田制、賦役制度密不可分,本文借助敦煌吐魯番新、舊戶籍類文書,結合傳世史料,探索隋唐丁中制的淵源,以及其中體現出的南北(南朝北朝)東西(北齊與北周)之關係與互動,希望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有所推進。

一 十六國“五涼”戶籍“丁中”記錄與晉制

五胡十六國時期,多由少數民族政權割據北方,各項制度都表現出了臨時性和過渡性,對漢魏以來的傳統有所變異。不過河西地方,由於五涼政權的平穩運營以及中原學術文化世家的遷入,得以保存漢魏、西晉之文化餘脈。“河西文化”雖行於邊地,隨着北魏政權統一涼州的完成而進入平城,在北魏以及以後的北朝接受漢晉文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卒得輾轉灌輸,加入隋唐統一混合之文化”,陳寅恪先生稱之為“承前啓後,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①陳先生對“河西文化”在魏晉隋唐間的特殊意義之提示,後來陸續得到了歷史學、考古學資料及研究的印證。如在石窟造像中“涼州模式”、書體上“北涼體”的形成;^②在喪葬文化方面,張銘心先生研究十六國時期河西墓誌,發現“河西圓首碑形墓表”的獨特形制,既繼承了漢晉已經出現的圓首碑形墓誌之傳統,又在此後北魏平城時代的墓誌形態中占據了重要地位。^③

①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9A1。

② 參考宿白《涼州石窟遺迹和“涼州模式”》,《考古學報》1986年第4期,頁435—446;施安昌《古代書法地方體》,《善本碑帖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頁240—272。王素先生以為或許更為確切的說法是“涼州體”。

③ 張銘心《十六國時期碑形墓誌源流考》,《文史》2008年第2輯,頁37—54; (轉下頁)

上述研究都還在文化層面。在立國之各項制度運作層面，五涼政權也有意延續漢晉舊制。“丁中制”的研究當為一個具體例證。前述西晉“戶調之式”形成了較為齊整的丁中老小制度，而十六國時期，五涼政權相繼統治的河西、吐魯番地區（高昌郡），是否延續了西晉丁中制呢？

對此史書記載甚少，所幸敦煌吐魯番兩地存有的這一時期的紙寫本戶籍文書，被陸續發現。20世紀初發表的西涼建初籍，曾引起學界探討十六國賦役、兵制的熱潮。^①近年來，關尾史郎先生又比定出兩件高昌郡時代的戶籍，一是德藏北涼承陽籍，一是俄藏高昌縣都鄉某里戶籍殘卷。^②2006年，吐魯番洋海墓地發現了前秦統治下高昌郡的戶籍，《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下簡稱《新獲》）整理小組定名為《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③作為目前所見紙寫本的最早戶籍，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加上同墓所出另一件北涼高昌郡戶籍殘卷，目前所見到的十六國時期五涼戶籍共有五件，按時代列表如下：

（接上頁）《司馬金龍墓誌出土碑形墓誌源流淺析》，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頁553—562。

- ① 最初由大英博物館翟林奈氏加以研究並全文公佈，Lionel Giles, “A Census of Tun-Huang”,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6, No. 4 (Oct., 1915), pp. 468-488.
- ② 參考關尾史郎《從吐魯番帶出的“五胡”時期戶籍殘卷兩件——柏林收藏的“Ch6001v”與聖彼德堡收藏的“Дх. 08519v”》，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編《吐魯番學研究——第二屆吐魯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頁180—190。
- ③ 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76—179。

表二 “五涼”時代(304—439—460)戶籍一覽^①

文 書 定 名	編 號	出土及發表時間
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籍	2006TSYIM4: 5-1 2	2006年出土 2007年發表
西涼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籍	B. L. S113	20世紀初出土 1915年發表
北涼承陽二年(426)十一月高昌郡高寧鄉戶籍殘卷	Ch6001V	20世紀初出土 1997年發表
北涼年次未詳(5世紀前期)高昌郡戶籍殘卷	2006TSYIM4: 3-13V	2006年出土 2007年發表
年次未詳(5世紀前期?)高昌郡高昌縣都鄉戶籍殘卷	Дх. 8519V	20世紀初出土 2003年發表

《前秦建元二十年籍》是這批戶籍中年代最早,保存信息最完整者,生動展現了十六國時期高昌郡戶籍原貌。爲使其儘早爲學界所知,在《新獲》一書出版之前,2007年,榮新江先生刊佈了該籍錄文,並對其年代、地點、內容、格式等進行了初步分析:錄文共分兩部分,各有13行、20行文字,共存5戶之戶口統計,土地、奴婢轉移記錄等,但涉及各戶人口的丁中記錄部分,文書多有殘缺。對於信息較完整的“張晏戶”,榮先生嘗試對各戶人口的年齡、丁中做了最大限度的推補,指出從戶籍中直接得到的丁中制信息是:丁男15—35歲,丁女20—53歲,小女6—9歲,小男1—8歲。隨後以年代最近的西晉丁中制,對前秦丁中制進行了推測,認爲可能是丁15—65歲,小1—14歲,或者還有次男一項,13—14歲,則小女、

① 列表中五件文書的出土、發表和研究狀況,本文涉及時機介紹,此處不再一一出注。

小男爲1—12歲。^①不過當時釋文與推補俱無“次男”、“次丁男”一項,我們還不能肯定前秦建元籍丁中記錄與晉制的直接聯繫。

2009年,榮先生參考王素先生對《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書評中所引及張榮強先生意見,又仔細對照圖版,修改了張晏戶下“丁中”記錄的錄文。除吸納張氏意見,將“**奴**丁男三”改錄爲“**次**丁男三”外,又將“丁男二”改錄爲“丁男一”,“小女二”調整爲“次丁女一”、“小女一”。與此同時,張榮強也發佈了他對該籍釋文的修改,微有差異,^②不久後,他也意識到這一點,改用榮新江修訂之錄文。^③現將修訂後的張晏戶之錄文逐入:^④

(前略)

6 高昌郡高寧縣都鄉安邑里民張晏年廿三

7 叔聰年卅五物故 奴女弟想年九
 桑三畝半

① 榮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期,頁1—27。

② 張榮強《〈前秦建元籍〉與漢唐間籍帳制度的變化》,《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頁16—38。作者雖然改正了“奴丁男”,但認爲從原錄文第9行到第13行的丁中記錄應依次爲:丁男一、丁女三、**次**丁男三、[小女二],主要問題在於對第13行張駒之妹丁中情況的判斷,張氏以爲是“小女”,但是該女子夾在兩個次丁男張駒、張奴之間,沒有理由不是次丁的年齡範圍。

③ 張榮強在將《〈前秦建元籍〉與漢唐間籍帳制度的變化》一文收入新著《漢唐籍帳制度研究》一書時,採用了新錄文,見該書頁224—227。

④ 此據榮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的淵源》一文所引錄文,原載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東洋文庫論叢》第72,2009年3月31日,頁201—212;收入孟憲實、榮新江主編《秩序與生活:中古時期的吐魯番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65—466。請注意該文注釋3,交代了修改錄文的原因。作者同時修改了2007年的《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一文,見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頁上提供的該文PDF版,http://www.zggds.pku.edu.cn/004/001/124.pdf。

- 8 母荆年五十三 晏妻辛年廿新上
城南常田十一畝入李規
- 9 叔妻劉年卅六 丁男一
得張崇桑一畝
- 10 晏女弟婢年廿物故 丁女三
沙車城下道北田二畝
- 11 婢男弟隆年十五 次丁男三
率加田五畝
- 12 隆男弟駒[年] [次丁女一]
[舍 一]區
- 13 駒女弟[口年] [小女一]
[建元廿年三月籍]
- 14 聰息男[奴年] 凡口九

(後略)

戶籍中正式出現了與晉制相吻合的“次丁”的稱謂，另有“小”、“丁”。統計該籍中其餘各戶之丁中、年齡，皆未見到“老”，記為“小”的年齡有8、9歲，記為“丁”的年齡有20、23、28、46、50、53歲，對比起來，“小”與“丁”完全符合晉制小（12歲以下）、正丁（16—60歲）所囊括的範圍。

而比較麻煩的是“次丁男”張隆及張駒、張奴、“次丁女”張駒之妹，年齡記載均殘缺，我們可以推測一下這幾個人的年齡。這裏要先明了戶籍書式，榮新江先生以為，具體登記小男、小女時是按照每個人年齡來依次記錄的。後面要詳細介紹的西涼建初籍也是如此，即每行書一人，書明本行人與前行登記者（或戶主）的關係（如“晏女弟”、“隆男弟”等，實際上是名+親屬稱謂），同時排列順

序則是依據年齒大小，後一人比前一人年齡要小。^① 據此，則張駒、張駒妹與張奴三人夾在 15 歲的張隆與 9 歲的張想（小女）之間，這三個人年齡範圍當為 10—14 歲。接下來我們嘗試着將晉制次丁的年齡（13—15 歲）代入，張駒與張駒妹為兄妹關係，不大可能同歲，^② 所以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張駒 14 歲，其妹 13 歲，而張奴或為 13 歲（係張晏叔叔張聰之子，與張駒兄妹二人可同歲）。這樣安排下來，頗為順暢，最終的結果既符合戶籍書式，又合於晉制。

另外，從女口的丁中來看，歷代官府對於女子成年與否，存在着以年齡和以婚姻狀況來劃分兩種標準。筆者曾經討論過走馬樓吳簡戶籍簡反映的孫吳女性之年齡稱謂，“大”與“小”的劃分並不以實際年齡（15 歲），而是以出嫁與否為據，因而出現了成年的“子小女”與未成年的“妻大女”，並注意到女口丁中依附於婚嫁男性的現象同樣存在於北朝及唐代敦煌。^③ 張榮強先生繼續討論了南北朝至隋唐對女性丁中記載的處理。^④ 從前引西晉戶調之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已上為

① 這其實是簡牘時代書寫習慣的遺留，一枚戶籍簡一般只書寫 1—2 個家口（吳簡尚有 3 人同書於一簡的連記簡），一旦相連的一家的簡冊散亂以後，可以單枚簡上保留的戶主或相關聯的家口的名字等為依據，對冊書加以復原。走馬樓吳簡中的名籍簡便是這種情況，所以汪小煊、楊際平、侯旭東等先生先後嘗試對其進行復原研究。參看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各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9 年第 1 期，頁 57—93。

② 敦煌吐魯番所見戶籍中，兄弟姊妹同歲者為很少數，吳簡中也僅有很少數幾例。

③ 詳拙文《走馬樓簡中的成年待嫁女與未成年已嫁女》，卜憲羣、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 200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62—276。

④ 張榮強《唐代吐魯番籍的“丁女”與敦煌籍的成年“中女”》，《歷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25—35。

老小,不事”來看,西晉“丁女”要“課田”,她們與丁男一樣,都是以年齡為標準劃分的,與孫吳不同。本籍“張晏”戶下53歲的“母荆”、46歲的“叔妻劉”,其夫皆已故去,若以婚姻狀況為準,當稱“丁寡”,而張晏20歲的妻子“辛”當稱“丁妻”,但實際這三人在籍身份皆作“丁女”,“晏女弟婢”“物故”,未入統計,其身份亦應為“丁女”。說明前秦統治下的高昌郡,男女皆是以年齡劃分丁中,與晉制一致。衆多線索提示我們,前秦建元籍執行的丁中制應該正是西晉舊制。

如果說前秦籍“丁中”記錄與晉制相符,還有一處未安,即晉制之“次丁”尚有入老前一階段(61—65歲),而前秦籍在籍年齡最大者為“張晏母荆”53歲,未達到“次”與“老”之年齡,具體情況無法推知。出土於敦煌的年代稍晚的西涼建初籍(全名詳上文表2),則有與晉制相符的入老前一段的“次男”稱謂。原籍較長,這裏僅錄與論說內容相關的裴晟、裴保二戶:^①

(前略)

4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兵裴晟年六十五

5 息男醜年廿九 [丁 男 二]

6 醜男湊年廿五 次 男 〔一〕

7 湊妻馬年廿九 女 口 〔一〕

8 凡 口 四

9 居 趙 羽 塢

10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

(後略)

17 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兵裴保年六十六

18 妻袁年六十三 丁 男 二

^①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頁3—4。

19	息男金年卅九	次男	一
20	金男弟隆年□四	小男	一
21	金妻張年卅六	女口	〔三〕
22	隆妻蘇年廿二	凡口	〔七〕
23	金息男養年二	居趙羽塢	

(後缺)

其中反映的丁中記錄,有小男、次男、丁男,而女子則不計丁中,統稱為“女口”。結合整個戶籍,所直接見到的丁中年齡是:小男 2—10 歲,丁男 15—56 歲,次男 65—66 歲,大體與晉制相符合,次男正是晉制次丁入老前的那個階段。所不同的是,進丁提早一年(15 歲),入老推遲一年(66 歲未入老)。池田溫先生認為,丁男年齡的上下限較為擴展,表明了戰亂時代十六國政權的特性。^① 前秦建元籍所反映的高昌郡的丁中實施情況,並補充西涼建初籍所反映的敦煌郡的丁中實施情況,可以較為完整地說明西晉丁中制在五涼政權的貫徹實施。

西涼過後,沮渠氏北涼統治高昌,曾奉行過與大夏“承光”年號相似的“承陽”年號。1997 年西脇常記從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中發現戶籍殘卷(Ch6001V),並首先刊佈了圖版,但對不見於史籍的“承陽”年號產生了疑問。^② 1998 年,關尾史郎先生比定該文書,命名為“北涼承陽二年(426)十一月高昌郡高寧鄉戶籍殘卷”,^③正是這一時期的材料。西脇氏與東洋文庫對此文書

①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龔澤銑譯,北京,中華書局 2007 年,頁 53。

② 西脇常記《ベルリン・トルファン・コレクション漢語文書研究》,京都大學総合人間學部國際文化學科日本・中國文化・社會論講座西脇研究室,1997 年,圖版 11,頁 81。

③ 關尾史郎《“承陽”備忘——〈吐魯番出土文書〉割記再補》,《東洋史苑》(轉下頁)

的錄文都只有一欄 無缺文符號^①關尾氏增補了第7、8行的缺字元^③榮新江先生則指出,此籍應為上下兩欄,從而對其進行了重新復原,現將復原後錄文逐入:^③

(前缺)

1]	凡	[
2]	承陽二年十一月籍	
3]		
4]		
5]□		
6]	丁男	一
7]	丁女	一
8]	小女	二
9]□	凡口	四
10]	承陽二年十一月籍	
11]		
12]	老男	二
13]	凡口	二
14]	承陽二年十一月籍	

(後缺)

雖然信息不多,但我們還是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丁中記錄有:

(接上頁)第50、51合刊號,1998年,頁253—265。此文承榮新江先生見示。

- ① 西脇常記《ドイツ將來のトルファソ漢語文書》,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頁44—45。
- ② 見關尾史郎著《“承陽”備忘——〈吐魯番出土文書〉割記再補》,以及《從吐魯番帶出的“五胡”時期戶籍殘卷兩件——柏林收藏的“Ch6001V”與聖彼德堡收藏的“Дх.08519V”》文。
- ③ 榮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頁24。

丁男、丁女、小女和老男，“丁女”的存在，說明女口也是以實際年齡劃分丁中，這似乎都不出晉制。

從以上戶籍我們可以推測，十六國時期的五涼政權統治區（包括河西五郡和高昌郡），戶籍編訂與丁中登記，仍然延續着漢晉以來嚴密而常規的運作傳統。西晉太康元年（280）的戶調之式，雖歷經少數民族政權前後更替，胡族文化浸染激蕩，仍能較為完整地體現在五涼政權的政策運作中。

二 南朝“丁中制”發展軌迹略說

南朝文化，尤其是後半期梁陳文物制度，是陳寅恪先生指出的隋唐制度三源之一，而奠定北朝制度基業的魏孝文帝改革與創制，亦由於王肅之北奔，吸取了南朝前期的先進文化因子。^① 中原士人南下而建立的東晉王朝，及相繼之南朝，很好地繼承了漢魏以往的傳統制度與文化，使其再傳至北朝隋唐。南朝丁中制的探索，由於缺乏戶籍類實物，我們只能借助史書記載略加鉤沉。總體上看，也呈現出了對漢晉傳統的繼承態勢。

西晉太康元年之丁中制，到東晉時期仍無改變，從《晉書》卷七五《范寧傳》所載東晉武帝時范寧上表可以看出，

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

^①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頁11—13。

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①

范寧對於西晉舊制入丁與半丁時間過早表示了不滿,建議今後將成丁、半丁年齡分別延後為20、16歲,結果是“帝善之”,不過這一建議並沒有得到實際執行。劉宋時,王弘上言:

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皆稱年……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宜,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丁。^②

意味着直到此時,西晉之舊制纔得到了改變,此前尚在行用中。王弘的建議,得到了皇帝採納,從而形成了劉宋新制,不過也僅僅是對進全丁、半丁年齡的延後,晉制的大體格局:全丁、半丁、老、小並無改變。

宋以後,梁、陳丁中制,可以從《隋書·食貨志》中對兩晉以來經濟制度演變回顧中得知: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為丁。^③

與宋制相比,也僅僅是進入半丁、全丁的年齡再一次延後。不過對

① 《晉書》卷七五《范寧傳》,頁1987—1988。

② 《宋書》卷四二《王弘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321。王弘上奏時間,本傳載於元嘉六年(429)後,孫曉林先生認為在元嘉六年(見其所撰詞條),高敏先生作了更細緻的分析,認為在元嘉六年到九年。高敏先生對西晉至劉宋丁中制的分析,見《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下),頁536—637。

③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頁673—674。

於女口丁中的區分，這裏顯示了婚姻與年齡兩重標準並行的情況，原則上成“丁”以出嫁與否為準，但女子如果成年（18 歲以上）未嫁，到 20 歲也自然成為“丁女”。這與兩晉的做法相比，既有沿襲，亦略有變異。現將兩晉南朝丁中制之變化列表如下：

表 三

單位：歲

丁中 朝代	小	次丁 (半丁)	正丁 (全丁)	次丁 (半丁)	老
西晉/東晉	12 以下	13—15	16—60	61—65	66 以上
宋(齊)	14 以下	15—16	17—60	61—65	66 以上
梁/陳	15 以下	16—17	18—60	61—65	66 以上

從陳寅恪先生分析北魏孝文帝禮樂制度深受南齊影響以來，南朝在制度文化上影響北朝，似乎已經成為一種通行的敘事模式，由於中原士人、文化精英集團的南遷，東晉南朝得以延續漢晉以來的中原文化及制度，從而超越北朝，對大一統的隋唐文化產生深層次影響。不過在丁中制的演變中，起碼就現有的史料來看，南朝一源一直處於漢晉傳統籠罩之下，是很難獨立變革，孕育出隋唐完備的“黃小中丁老”制度的。^①或許南北方差異正在於對禮樂制度與實用性制度（陳寅恪先生所謂“充實物質之政策”^②）的不同態度上。丁中制這種實用制度，有待於在北朝富國強兵的一系列實踐如均田制、府兵制中，加以錘煉、磨洗，最終對統一之洪流發揮推波

① 當然史書中並沒有留下南朝丁中制的詳細記載，本文列表所總結的丁中名目及年齡段，也不能說展現了南朝制度的全貌，也許如王素先生的提示，南朝對隋唐制度的影響，不可低估。

②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職官”部分，用“充實物質之政策”指代北周宇文泰富國強兵之措施。見頁 91。

助瀾的作用。

總括本文第一、二部分之討論,我們可以有一個大略的判斷,即丁中制在十六國五涼政權統治的河西地區,以及東晉南朝的發展態勢,基本是因襲和繼承。西晉戶調之式中的“小”、“次丁”、“正丁”、“老”,不僅在名目上沒有發生變化,對於女口丁中的處理,也主要是以實際年齡為成丁標準。有細微調整的,僅是丁和次丁的年齡方面,東晉南朝入丁年齡逐漸延後及丁年跨度的縮減,顯示了官府對於丁身的課役控制有所鬆弛。至梁陳間,成為正丁的年齡是 18 歲。

三 兩步變化: 北朝隋唐“黃小中丁老”制度的衍生

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全書結尾“門閥政治的暫時性和過渡性”一節中有一句意味深長的判斷“從宏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①雖然田先生是從三百年皇權政治的角度立論,但其宏觀的歷史感受,值得深思。閻步克先生在進行南北朝官品、官階制度研究時,也強烈感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部族制度與華夏制度劇烈碰撞,孕育出“強勁的官僚化運動”,“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國的歷史出口”。^②其實正如上一部分結尾所言,北朝的制度活力,體現在法制、戶籍、土地、選官等一系列實用性制度的建立和有效運作上,

①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360。

② 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93。

三長制、均田制、府兵制、戶籍計帳之法皆源於北朝。而丁中制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爲了控制人口以便於徵發賦役，既然土地制度、兵制、戶籍制度等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勢必導致北朝丁中制之演化。

前文已述，晉制與隋唐黃小中丁老之制相比，須要經過兩步變化，一是去掉次丁入老前之一階段，形成真正的“中”；二是在“小”的年齡段之前再加上“黃”。對南朝相關體制的回溯，顯然不能揭示這些變化，我們只能把目光放在北朝。“中男”稱謂最早出現於北魏孝文帝實施均田法之前的太和元年（477），“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①此時北魏實行“計口授田”制，高敏先生以爲此規定僅是“計口授田”制的更系統化、嚴密化推廣。筆者以爲，此舉毋寧說是爲向均田制過渡作準備。因爲均田制下，十五歲以上男夫與十一歲以上半夫受田數，正與此相符，而計口授田則無須區分年齡。^②北魏的丁中制，史無明載，但借助於太和九年實施均田制的法令，可稍作推測，現列舉相關令文如下：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

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

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

諸有舉戶老小癯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癯者各授以

① 《魏書》卷七上《高祖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44。

② 楊際平先生也認爲太和元年課田令很可能是太和九年均田令規定的濫觴，見氏著《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頁26。

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①

男子年十五以上正式受田,而十一歲受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據此推測,或許北魏的丁中制是:10歲以下爲小,11—14歲爲中,15歲以上爲丁,70歲左右入老。這裏有一個最大的疑惑是北魏是否還存在入老前的一個階段之次丁?記載中授以半夫田的,只有11—14歲的男子(中男),高敏先生認爲存在這樣一個階段,²歲—69歲,這是依據晉以來的傳統。^②但“中男”稱謂的出現,取代以往表述中的“次丁”、“半丁”,似乎昭示着,這圍繞“丁”的兩個對稱性過渡階段已經發生了變化和整合:入老前部分并入“丁”,成丁前的階段則加以保留並專稱爲“中”。鄧文寬、楊際平先生皆持類似看法,認爲北魏丁年爲15—70歲,丁年跨度較寬。^③

北魏後,東魏北齊與西魏北周分立,土地制度方面,均繼承了均田制,與之相伴的自然是在戶籍、丁中之法。魏周丁中制度,傳世史書均無明確記載,僅《隋書·食貨志》提供了零星資訊: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癯者,皆賦之。……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句。

相比之下,北齊丁中制則頗爲明晰,見於河清三年(564)令文:

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

①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頁2853—2854。

② 上引高敏先生意見見《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頁267—270。

③ 鄧文寬《北魏末年修改地、賦、戶令內容的復原與研究——以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爲線索》,頁270;楊際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頁33。

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①

這裏顯示,北齊男子在丁中劃分上形成了齊整的丁、中、老、小四個階段,去掉了晉制及南朝制度中的“次丁”入老前的階段。^②北齊的變化,承自北魏,既保留了北魏制度中原有的漢晉傳統,又吸納了北魏的變革因素,由晉制至隋制轉變的第一步,歷北魏、北齊,“中”階段形成。

比較棘手的問題在於勾勒“黃”這一語彙加入北朝隋唐丁中名目的過程。之所以說棘手,是由於“黃”的年齡段在3歲及以下,這樣的嬰孩既不需要承擔課役,在唐代的情況,如果不當戶,亦不須受田。也就是說,“黃”本身沒有課役含義。《魏書》、《隋書》之《食貨志》所記載的揭示北朝丁中制的令文,如北齊河清三年令文,通常只涉及與稅、役關係密切的丁中名目與身份。日本學者菊池英夫認為,不能因為河清三年令文中無“黃”之記載,即否定北齊有“黃”之丁中名目,令文有將其省略的可能性。^③這樣一來,討論“黃”不能單以史書為依據,我們不妨把目光轉至出土文獻。

目前所見到的較早的關於“黃小中丁老”的文書,有P. 2667殘卷《甲種算書》。^④算書寫本存六十一行又十字,包括一道殘題在內,共十三題。題目內容分為:人、馬日廩給口糧之計算、工程營造、軍旅編制、步里換算、米粟計量等,透露出了極為豐富的社會經濟、軍事信息。李儼、王重民先生都曾對此殘卷作過介紹和考

① 《隋書》卷二四《食貨志》,頁679-677。

② 高敏先生據60歲免力役而66歲退田免租調,指出北齊仍存在60—65歲的次丁階段。但令文中只有“丁”、“中”、“老”、“小”之稱謂記載,並無“次丁”,且次丁的身份亦不是完全免力役,尚須服雜役或者半役,可以認為其判斷缺乏依據。《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下),頁565。

③ 菊池英夫《敦煌發見〈算書〉に見える軍制模式についての考察》,《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史學科》第35號,1990年,參考頁62—64相關論述。

④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48上一下。

訂。據算書第一題有“小男”、“黃男”名目,及“總並五位”等語,即“黃小中丁老”五男名目,判定此書為“唐代算書”。^①原卷第一題僅存六殘行,李儼先生曾補出三百餘字,這裏為保持原貌,不錄補入部分,僅以郭正忠校錄本為準,將第一題內容抄錄如下:^②

……斛八斗四升,^③□置之於上方。……五十四人。
□□□乘之,即得小男一日食米七百七斛七斗。所置於上。
次……二斗乘之,退位二等,得黃男一日所食米二百卅一
(十)□四斗四升。總並五位,……六千七百七十五斛五斗八
升。上十之。得十日之食六萬七千七百五十五……得一月之
食廿萬三千二百六十七斛四斗。又以十二乘之,得一年之食
二百卅……百廿[八]斛八斗。

題目中的“小男”、“黃男”的確顯示了“五男制度”的行用,但究竟在何時開始使用,則涉及到對整個算書年代的判定。

1990年,菊池英夫在李儼先生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詳細分析了此算書。據本條及其他算題所提供的信息,尤其是第十題有“儀同”、“營主”、“都督”、“將”、“師”(帥)、“火”、“馱”的領軍編制,認定算書所記是北周、隋初現實軍制。^④郭正忠又進一步指出,“儀同”作為特定軍銜始見於北魏,使用最為頻繁在北魏末至西魏。又結合其他算題,總體認為該算書主要反映的是北魏末至

①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卷三,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頁158—159;李儼《中國古代數學史料》一書第9節《敦煌千佛洞算書和算表》,收入《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2),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40—41。

② 郭正忠《〈甲種敦煌算書〉的考校和釋補》,《自然科學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1—11。

③ 原算題中的計量單位為“研”、“升”、“斗”,分別相當於常用的“斛”、“斗”、“升”,今改從正字。算題採用的量制非唐制,係用隋唐以前之古升。

④ 菊池英夫《敦煌發見〈算書〉に見える軍制模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頁57—82。

西魏,乃至北周的社會狀況。^① 他們的分析大體可從。敦煌文書中關於五男日給口糧的算題,顯示大約從北魏末開始,“黃小中丁老”的五男制度已經誕生。

但仍有一點須注意,算書揭示的是北朝軍人的廩給制度。“五男”依據年齡、生理需求不同,每日按不同數量給糧。郭正忠先生對“五男”的日廩給量作了詳細計算,此不贅述。問題是“黃”本身無課役含義,而編戶齊民在一般情況下不接受國家廩給,那麼“黃”會作為丁中身份,出現在國家控制人口以徵發賦役的戶籍類文書中嗎?

敦煌出土的西魏大統年間戶籍類材料,證明了“黃”在北朝已經作為與“丁中老小”並列的丁中名目。該文書由日本學者山本達郎首先予以介紹,隨後有曾我部靜雄、楊聯陞、菊池英夫、西村元佑、佐佐木榮一、池田溫以及前述國內學者的討論,切入點有所不同。^② 本文只關注其丁中記載。文書命名為“西魏大統十三年(547)瓜州效穀郡?計帳”,全長6米餘,計為17張紙連貼殘卷,共有文字約三百行,這裏僅挑選其中之一戶作介紹分析,但已足夠說明問題。以下是錄文:^③

(前略)

59	戶主白醜奴丁亥生年肆拾壹	白丁	課戶中
60	母高阿女壬寅生年捌拾陸	老妻	
61	妻張醜女丙申生年叁拾兩	丁妻	

① 郭正忠《一部失落的北朝算書寫本——〈甲種敦煌算書〉研究》,劉東主編《中國學術》(6),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07—232。

② 山本氏研究著作見本文頁259注③,對於其他學者研究的介紹和述評,參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頁55—57“西魏的籍帳”,頁79—80注釋25—35。

③ 原錄文本戶下方,尚包括家口課役集計,因與本文論述無關,茲省略。見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頁20—21。

62	息男顯受庚戌生年拾捌	白丁 進丁
63	[息女□□丙辰生年拾兩	中女]①
64	息男阿慶丙辰生年拾兩	中男
65	息男安慶丁巳生年拾壹	中男
66	息女未客壬戌生年陸	小女
67	息女未醜戊午生年拾	中女
68	息女暈庚申生年捌	小女
69	弟武興壬寅生年叁拾陸	白丁
70	興妻房英英己亥生年兩拾究	丁妻
71	興息女阿暈甲子生年肆	小女
72	興息女男英甲子生年肆	小女
73	興息女續男乙丑年生年兩	黃女 上

(後略)

白醜奴一户中的丁中記錄,不僅有“丁”、“中”、“老”、“小”,還有一個兩歲的“黃女”。整件文書中,尚有兩個兩歲的黃男。② 統計文書可知,西魏大統年間的丁中制是:黃 1—3 歲,小 4—9 歲,中 10—17 歲,丁 18—64 歲,老 65 歲及以上。這裏“黃小中丁老”的丁中劃分,甚至早於北齊河清三年(564)的“丁中老小”之制。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前引《隋書·食貨志》所記西魏北周“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癯者,皆賦之”,18—64 的年齡劃分,正與本籍丁年之劃分相吻合。

北朝對女口丁中的處理,前引北魏太和九年田令“諸男夫十五

① 本行原缺,池田溫氏根據該戶家口的課役集計對相關信息進行了推補,認為還應存在一個十二歲的“中女”。見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頁 20。

② 該籍中四歲的家口,稱為“小”,僅延天富戶下四歲的男子下注明“黃男”,但據下面之總計“口二不課:口一黃年二,口一小男年四”可知此“黃男”為筆誤,“黃”之年齡段應該是 1—3 歲。

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提示，北魏婦女依附男子受田，不單獨受田；而北齊河清三年令文僅言男子受田與課役負擔，不及女子。據張榮強先生梳理，整個北朝系統未婚的成年女子都不受田，不納賦稅。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北朝女子的丁中登記，涉及到成丁，不再嚴格以年齡為限，而是以結婚與否為準。^① 實例如前引大統文書中“王皮亂”戶下29歲的“女親”，早已超過18歲的成丁年齡，但由於係待嫁在室女，仍保留“中女”之稱謂。^② 這與唐代戶籍中成年在室女一律稱“中女”而已婚者皆依附其夫稱“妻”情況頗為一致。^③

順帶提一下雖獨立於北魏及東魏、西魏政權，卻深受其影響的麴氏高昌王國的丁中制。此前已有盧開萬、楊際平、凍國棟等學者依據高昌國時期文書予以討論。^④ 其時百姓年滿15歲以上者需交納“遠行馬價錢”並承擔“城作”之役，15歲應該是成丁年齡。這可能是受北魏影響，而與北齊、北周18歲成丁不同。

隋唐之丁中制，《隋書》、《新唐書》之《食貨志》、《通典·食貨典》俱有明確記載。仁井田陞復原之唐《戶令》有“丁中老小”條，收有武德、開元七年及開元二十五年令文，其中開元二十五年令作“諸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五歲以下為小，二十以下為中。其男

① 張榮強《唐代吐魯番籍的“丁女”與敦煌籍的成年“中女”》，頁27—30。

②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頁19。

③ 唐代民戶籍所見成年男子身份有“白丁”、“老男”、“衛士”、“職資”等，其妻子則相應稱為“丁妻”、“老妻”、“衛士妻”、“職資妻”。

④ 盧開萬《試論麴氏高昌時期的賦役制度》，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頁66—99；楊際平《麴氏高昌賦役制度管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頁79—94；凍國棟《麴氏高昌役制研究》，《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1期，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64—100。

年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無夫者爲寡妻妾。”^①日本鈴木俊氏對上述材料進行梳理,揭示出丁中制在唐代經過五次調整,“黃小中丁老”的名目並無改變,僅入中、丁、老之年齡有所浮動。^② 參照其研究成果,將北朝至隋唐丁中制情況列表如下,以便比較:

表 四

單位: 歲

時代 \ 丁中	黃	小	中	丁	老
北魏太和九年(485)		10 以下	11—14	15—70?	70 以上?
西魏大統十三年(547)	1—3	4—9	10—17	18—64	65 以上
北齊河清三年(564)		15 以下	16—17	18—65	66 以上
隋開皇二年(582)	3 以下	4—10	11—17	18—59	60 以上
隋開皇三年(583)	3 以下	4—10	11—20	21—59	60 以上
隋煬帝初	3 以下	4—10	11—21	22—59	60 以上
唐武德七年(624)	始生—3	4—15	16—20	21—59	60 以上
唐神龍元年(705)	始生—3	4—15	16— 21/22	22/23— 57/58	58/59 以上
唐景雲元年(710)	始生—3	4—15	16—20	21—59	60 以上
唐開元二十五年(737)	始生—2	3—14	15—19	20—59	60 以上
唐天寶三載(744)	始生—2	3—17	18—22	23—59	60 以上
唐廣德元年(763)	始生—2	3—17	18—24	25—54	55 以上

注: 北魏丁中制僅爲推測,唐丁中制參考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所引鈴木俊《唐代丁中制的研究》總結“黃小中丁老”的年齡規定變化之表格,見該書頁120注111,並依《通典》、《唐令拾遺》等書的相關記載,略有改動。

① 仁井田陞著,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長春出版社,1980年,頁132—134。

② 鈴木俊《唐代丁中制的研究》,《史學雜誌》46—9,1935年。

從表四可以看出，北魏“中”的年齡段，去掉“老”次丁部分，同時為西魏和北齊所繼承，而從北魏至西魏、北齊丁中制的變化，體現在“中”年齡組的下拉（北魏 11—14 歲，西魏 10—17 歲，北齊 16—17 歲），成丁年齡的延後（15—18 歲）以及丁年跨度的縮短。涉及北朝東、西制度之差異，我們雖不能確定北齊是否有“黃”的年齡分層，但僅從小、中、丁、老四段的年齡劃分上看，西魏丁中制除入老年齡外，與隋制極為相似；而晚此十七年的北齊河清三年之制，從名目和年齡劃分而言，都與隋制有相當的差距。但北齊丁中制與上文回顧的南朝後期梁陳情況，呈現了許多一致性，皆是 15 歲以下為“小”，16—17 歲為“中”（次丁），18 歲成丁，66 歲以上入老，不同之處在於北齊去掉了南朝“老次丁”階段（61—65 歲）。這也提示我們，歷史發展呈現出多面性，南朝雖不占據丁中制變革之主流，但在南北朝後期，隋統一之前，南北在相互影響、交融與回饋中，某些制度已極為相似，乃至趨於合流。

四 從“丁中制”看魏晉隋唐歷史變遷

長時段地審視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洞悉由魏晉至隋唐的社會變遷，前輩學者已經做了許多具有示範意義的工作。《唐研究》第 13 卷《從漢魏到隋唐：變遷與延續研究專號》就體現了相關領域學者上下貫通的意識。本文不打算談宏觀歷史感受，而謹願從社會經濟史一隅，以丁中制這項具體制度為個案，勾勒漫長時空中，丁中制變化、“黃小中丁老”齊整制度衍生的軌迹。分析變化產生的原因，“中男”如何取代“次丁（男）”，“黃”之名目為何出現，以期有利於深入南北朝、隋唐具體制度運作的現場。

(一) 南北朝隋唐的“次丁(男)”與“中男”

前文已從史實上簡單陳述了由“次丁(男)”至“中男”的演替，重要轉捩點在北魏均田制的實施，但並沒有直接說明次丁入老前部分消失，併入正丁的原因。這涉及到晉以降南北朝至隋唐，“次丁(男)”階段在賦役中所扮演的角色。前引西晉戶調之式規定的課田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次丁男要承擔半課。而前引《隋書·食貨志》所述南朝制“男女年十六歲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表明整個南朝系統中，次丁男皆要半課。與晉制同。相反北齊河清三年令文規定，16—17 歲的中男，則既不需要受田，亦不需承擔課(租調)與正役。現總結分散於前文的材料，將兩晉南北朝次丁、正丁年齡劃分及次丁承擔課役情況列表如下：

表 五

單位：歲

時代 \ 丁中	次丁 (中)	正丁	次丁	次丁(中男)負擔	丁年跨度
西晉/東晉	13—15	16—60	61—65	半課、半役	44
劉宋	15—16	17—60	61—65	(半課?)、半役	43
梁/陳	16—17	18—60	61—65	半課、半役	42
北魏	11—14	15—70		中男受半夫田	55
北齊	16—17	18—65		不受田，不輸租調， 不承擔力役	47
西魏	10—17	18—64		不受田，不課口	46

從表五中可以明晰看出，在兩晉南朝占田、課田制下，次丁(男)皆要半課、半役，承擔一定的課役負擔；而在北朝系統中，實行均田制，中男在一般情況下不課不役，亦不受田，完全脫離於國

家賦役系統之外。這一變化始自北魏，其時年 11 歲以上的中男，雖仍得到二十畝的授田，但與其相配的租調制規定，“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①這說明賦課乃以一對夫婦為標準，單丁承擔夫婦負擔的四分之一，而年 15 歲以下未成丁者，沒有租調與力役負擔，這與以後北齊、西魏情況相同。

次丁入老前階段為何會在這一時期消失，可以嘗試從均田制土地收授的角度予以解釋。男子到 11 歲受田 20 畝，至 15 歲成年再受田 20 畝，共 40 畝。而這 40 畝露田至“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即到 70 歲左右免老時纔一并退還。但如果免老前四五年還有一個“次丁”階段，則依“次丁”之身份規定，也只能擁有半夫田，即需先退田 20 畝，免老時再退 20 畝，這樣操作頗為麻煩，將此階段劃歸入“丁”，有利於授田的便捷操作。

最主要原因在於與兩晉南朝相比，北朝“次”（中）的階段並不承擔課役，這一年齡段過長，則不利於官府控制人口多徵發賦役。保留次丁成丁前的部分，代之以“中”的名目，同時將入老前之“次丁”并入正丁，這樣便可以大大拉寬丁年跨度。丁年越長，官府課租調的收入就越多。北朝丁年跨度明顯長於兩晉南朝，北魏更是長達五十五年，顯示對民戶人身控制的加強。

從前文表四中，我們可以看到隋以後成丁年齡逐漸延後，入老年齡提前，丁年跨度愈窄，與北朝情況不同。不過唐代的“中男”，一般情況下也不承擔課與正役負擔，見於唐開元二十五年《戶令》：“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子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戶。”^②開元二十五年男子 20 歲進丁，20 歲

①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頁 2855。

② 《唐令拾遺》，頁 132。

以下,正是“中男”。又《新唐書·食貨志一》載“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①中男在18歲以上,方始受田。中男不承擔正役與兵役,僅在本州本縣境內服役,稱爲“雜徭”。^②從這個角度看,由北朝至隋唐,呈現出一貫的發展趨勢。

北朝“中男”名稱出現後,取代了“次丁”的稱謂,而爲隋唐帝國丁中制所繼承。有唐一代,中男年齡上下有所浮動,但名目、含義(成丁前的過渡階段)並無改變。頗爲奇怪的是,唐代差科簿中偶有“次男”的稱謂,在P.2803號《唐天寶年代敦煌郡敦煌縣差科簿》中,出現了三個“次男”,不過從年齡看,都是19歲,屬於“中男”的年齡階段。^③其他差科簿及敦煌吐魯番唐代戶籍中,再無“次男”表述,都是“中男”。^④唐代不再有入老前一個階段的“次(丁)男”,當無疑問。

(二) 隋唐“黃”之淵源及其現實功用

自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中首次出現“黃”這一丁中名目之後,前引《新唐書·食貨志》及唐令《戶令》等,都明確點出了“黃”的年齡層劃分,或曰始生,或曰三歲以下。在存世的唐代沙州、西州戶籍、手實、鄉帳、點籍樣等籍帳文書中,屢屢見到黃男、黃女的記載,“黃”的區分被嚴格執行,較少將“黃”、“小”混淆不分的情形。但問題隨之產生,“黃”本身沒有課役含義,3歲以下的嬰兒當然不能承擔課役,那麼作爲賦役徵發依據的丁中制,爲何會在“小”之下

① 《新唐書》卷五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342。

② 參楊際平《唐前期的雜徭與色役》,《歷史研究》1994年第3期,頁75—86。

③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錄文),頁139—140。

④ 筆者依照榮新江先生所製《已刊敦煌吐魯番發現唐代戶籍文書簡目》翻閱了所有戶籍,俱無“次男”。參考榮新江《〈唐開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縣南平鄉籍〉殘卷研究》,《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頁33—43。

再增添出“黃”這樣一個組別來呢？

對於唐人用“黃”作為嬰兒階段的丁中組別之代稱，古人已有解釋。如明人方以智《通雅》卷一九《稱謂》“尺口”條“謂家口尺以上也。董卓殺隗基家尺口以上。自云八口之家，即稱家口。《捉溺歌》‘只生口’謂多此一口也。小兒黃口，因雀借稱，而口數遂云始生為黃。”方氏進而認為明代統計戶口之“黃冊”得名於唐代“黃小中丁老”之制，見同書卷二六《事制》：“黃冊，以黃小而名也。近時黃冊，凡郊祀以賦籍陳，發畢收藏，著為成式，每歲總數，十年攢造。……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故相沿號曰黃冊。”^①明人張萱亦持類似看法，“黃冊，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劉宋時已有之，……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即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②“黃”字在含義上看，確指幼兒，在古代文獻中，常以“黃口”、“黃吻”、“黃頤”等指代幼兒，在唐代亦有其例。如《新唐書·百官志一》述官奴婢等賤口的名籍，“每歲孟春上其籍，自黃口以上印臂，仲冬送於都官，條其生息而按比之”。^③

在“小”之下詳細劃分出“黃”即嬰兒，在南北朝隋唐以前即有其淵源。較早可以追溯到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有關於刑徒每月口糧的文字：

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小城旦、隸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49)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

① 方以智《通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57 冊，頁 410 上 523 下。

② 張萱《疑耀》卷二《黃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56 冊，頁 196 下—197 上。

③ 《新唐書》卷四六，頁 1200。

一石。嬰兒之母(無)母者各半石;雖有母而與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禾(50)月半石。隸臣田者,以二月月稟二石半石,到九月盡而止其半石。春,月一石半石。隸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隸妾、舂高不盈(51)六尺二寸,皆爲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倉(52)①

秦最初以身長而非年齡作爲課役標準,“小”劃分爲“作者”與“未能作者”,大約相當於秦漢年齡分層中的“使”(7—14歲)與“未使”(7歲以下)。值得注意的是,“未能作者”以下,還存在“嬰兒”這一廩給年齡層。“作者”、“未能作者”、“嬰兒”每月得到的口糧數量遞減,而嬰兒無母或與母“冗居公者”,能得到“禾月半石”。

香港中文大學藏簡牘中有一組西漢昭帝元鳳二年(前79)《奴婢廩食粟出入簿》,于振波先生曾對其所反映的奴婢廩食標準進行研究,其中所見到的對於奴婢的年齡稱謂包括大奴/婢(≥15歲)、使奴/婢(7—14歲)、小奴/婢(2—6歲)、兒奴/婢(<2歲)。這裏的兒奴/婢,也是在“小”之下再劃分出嬰兒階段,各個年齡層所得到的廩食依次遞減,兒奴/婢最少,僅有粟大石0.5石。②此外居延漢簡戍卒家屬廩名籍中,也可見到一歲兒童廩給量不同於未使小女的情況,③如:

-
-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32。
- ② 于振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劄記之一——關於奴婢之廩食標準》,簡帛網2006年2月25日首發,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5。
- ③ 學界曾借助居延所出廩食類簡對邊地戍卒家屬廩食標準進行總結,依年齡與性別差異,分爲大男、大女與使男、使女與未使男、未使女四個等級,限於篇幅,此不羅列。其中未使女的廩給標準最低,爲月用穀1石1斗6升大(小石),或7斗(大石)。參考 Michael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Vol. 2, pp. 67-69。森鹿三著,金立新譯《論居延出土的卒家屬廩名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00—112。

☐驚虜燧卒徐☐

妻大女商弟年廿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未使男益有年四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年一用穀一斗

●凡用穀四石六☐

317.2^①

此簡中一歲嬰兒的口糧，釋文不甚統一，或釋為“一斗”，或釋為“八斗”。于振波先生根據“凡用穀”數量計算，認為應以“用穀八斗”為是。^②又額濟納漢簡中也出現了年一歲的男子：

第卅一隧卒王敞 母大女☐如年六十二 見在署用穀二石九升少

子小男駿年一 見在署用穀七斗六升少☐

妻大女如年廿六 見在署用穀二石九升少

2000ES7SF1: 11^③

此例簡中大女月用穀量與預定標準（2石1斗6升大）小有出入，但大體相符。一歲小男“駿”的月用穀量為七斗六升少，接近上例中的八斗，而與未使女（1石1斗6升大）不同。同樣的一歲小男月廩給量接近8斗的例子，還有居延簡編號EPT65: 119簡例中“止北燧卒王誼”的兒子王益。^④

①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512。

② 參考于振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劄記之一——關於奴婢之廩食標準》一文。凡簡文中出現的用穀數量，皆以小石計，下同。

③ 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45。

④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428。

梳理這些例證,我們意識到,在“小”之下再劃分出相當於嬰兒的年齡層,也許正是基於受廩給的需要。從生理上來講,年齡的細微差別亦會造成其對衣食需求的數量上的差別。所以自秦漢以降歷代官府的給糧、給衣制度中,對於年齡層的劃分是最為詳細的。從居延漢簡戍卒家屬廩食簿及吐魯番文書中的給糧賬,我們可以窺見一斑。唐代的情況,李錦繡先生據天聖令復原唐《倉庫令》中,有“諸給糧,皆承省符”條,本此條提供之基本信息,結合相關給糧文書,她還原了唐代基本年齡分層,有九個等級,分別為:90歲以上,80歲以上,70歲以上,丁,18歲以上中男,16歲以上中男(老小),11歲以上小男(中小),7歲以下小男(小),黃。並指出,這九個基本等級在諸種制度中作用不一,依據制度特殊性,年齡劃分可上下浮動。^①

前引P.2667《甲種算書》中的“五男制度”,正是基於軍人的廩給制度產生的,即“黃”之年齡層劃分,可能最初適用於受廩給的特定人羣,因而出現在他們的名籍中。在唐代包括官奴婢(京司奴、官廩奴)、官戶、雜戶、流放刑徒、諸司色役人等。^②前引《新唐書·百官志一》記刑部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役(沒)官奴婢籍簿”,確實出現了“黃口”的字樣,“都官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俘隸簿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免。凡叛逆相坐,沒其家配官曹,長役為官奴婢。一免者,一歲三番役。再免為雜戶,亦曰官戶,二歲五番役。每番皆一月。三免為良人。六十以上及廢疾者,為官戶;七十為良人。每歲孟春上其籍,自黃口以上印臂,仲冬送於都官,條其生息而按比之。……附貫州縣者,按比如平民”。^③又見於

① 李錦繡《唐開元二十五年〈倉庫令〉所載給糧標準考——兼論唐代的年齡劃分》,上海社會科學院編《傳統中國研究集刊》(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304—316。

② 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066—1075。

③ 《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頁1200。

《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都官郎中’條“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男、女既成，各從其類而配偶之。每歲孟春，本司以類相從而疏其籍以申。每歲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注曰“每歲十月，所司自黃口以上並印臂，送都官閱貌。”^①官奴婢、雜戶、官戶等賤口名籍中有“黃”，見於唐西州戶籍中有“黃奴”、“黃婢”，這自然是爲接受官府給糧、衣、藥而對年齡層作的詳細劃分。而普通民戶一般不接受國家廩給，“黃”爲何會出現在民戶戶籍中？又有何現實意義呢？

這裏只能提供一些推測性的解釋。第一，唐代官府所掌握的登錄人名年紀身狀的名籍，登錄的範圍對象，基本上包括了唐朝轄區上自皇室宗親，下至賤民的各類居民，被宋家鈺先生稱爲廣義的“籍帳”。這其中包含登記民戶戶口的“籍帳”。宋先生曾對唐代各官署所掌重要名籍進行羅列，除戶部、州縣掌戶籍、計帳外，禮部、宗正寺所掌僧道籍簿，刑部所掌官奴婢、番戶、雜戶名籍亦具有戶籍性質，編造程式，也往往與民戶戶籍相同。^②孟憲實先生已借助吐魯番新出材料證明僧尼籍編造工作，從寺院手實到戶籍，與民戶籍大同小異，常常同時進行以節省行政成本。^③則刑部所掌官奴婢名籍之類的籍簿，也應當與此處於同一運作環節，對於各類名籍中年齡劃分的處理，必然呈現出高度一致性。唐代如此，此前北朝與隋的情況大概亦相似，大約在北朝中後期，軍事活動相對頻

① 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93—194。

② 詳細論述見宋家鈺《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70—75。

③ 參考孟憲實《論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編造爲中心》，《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頁136—143；《新出唐代寺院手實研究》，《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頁170—179。

繁，為官府服兵役、雜役者（如軍人、官奴婢）需要得到廩給，相關的名籍被大量編製出來，其中較詳細的年齡劃分，尤其是“小”下之“黃”，擴展並統一應用至北朝民戶戶籍，成為正式的丁中名目。因而出現了西魏大統計帳中“黃小中丁老”的劃分，並為隋開皇、唐武德戶令所繼承，形成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齊整的丁中制。

第二，關於民籍中“黃”的現實意義。普通民戶在一般情況下並不接受官府廩給，但在災年等非常時期，亦是官府正倉及義倉賑濟與貸借的對象。據張弓先生研究，唐代二百八十九年中遭受各種自然災害共達四百九十三次，使用諸倉進行賑貸亦有一百三十六次之多。^①在賑給撫恤制度中，依據每戶大小和人口丁中，向受災民衆發放的米、糧數量，自然是有所差異的。3歲以下嬰兒口食所需，自然與其他年齡段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黃”的年齡劃分，就成為官府賑給制度的有力配合和保障。

以上嘗試性地解釋了“中”與“黃”兩步變化產生的原因，揭示了丁中制從魏晉到隋唐的衍生源流。從時間與地域的轉換來看，晉制在十六國河西五涼政權及南朝宋齊梁陳政權，基本得到了完整的繼承和保留。而所謂的“中”與“黃”兩步變化，直接催生隋唐齊整的“黃小中丁老”制度，則僅發生在北朝的二百年間，這相對於晉唐漫長的歷史，也只是一個小時段。如前所述，北朝相對於南朝，側重於對實用性制度的變革，因而帶動了丁中制的轉化。但這兩步變化究竟產生於何時，有學者以為源自北魏後期對太和戶令、賦役令、地令之全面修改；^②也有學者認為，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

① 此據張弓《唐朝倉廩制度初探》一書的統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28—130。

② 鄧文寬《北魏末年修改地、賦、戶令內容的復原與研究——以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為線索》文。

所反映丁黃之制，不是北魏舊制，正是大統十年宇文泰用蘇綽改革計帳、戶籍之法的結果。^① 本文大致的判斷則是，這種變化產生在北魏太和到隋統一之前的時間段。

附記：本文先後得到王素、榮新江、孟憲實、劉後濱、韓樹峰等先生的指正；2010年5月8日提交榮新江、孟憲實、林世田主持的“敦煌西域讀書班”討論，承各位師友提出寶貴意見，謹一併致謝！

2009年7月初稿 2010年7月修訂

（本文作者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① 曾我部靜雄、佐佐木榮一氏認為文書反映北魏後期制度，與北周制不同，而山本達郎、池田溫從二長制傾向及六丁兵記載，主張為蘇綽改制後結果。從史實看，宇文泰派申徽赴瓜州，已實現了對敦煌直接統治，中間雖經叛亂，業已平定。相關討論參見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頁73—75“文書的背景”。

because consultants-in-ordinary regularly expected to attend audiences with the emperor in the major palace , Zichen Palace , of inner court in the 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ose Who Can See Ghosts” :

An Aspect of Shamanism in Medieval China

Sun Yinggang (p. 221)

Jiangui ren , or “those who can see ghosts” , provided service of communicating with ghosts and making common people see the beloved in the other world. Compared to systematic beliefs *Jiangui ren*’s theory enjoyed more freedom in describing ghosts and spirits. The belief rooted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insisted on the unification and separation between body and spirit while Buddhism denies the concept of “spirit”. However , this conflict did not prevent Buddhist monks from producing and representing ghost stories on their own terms. *Jiangui ren* faced the competition from not only Buddhism and Daoism , but also doctors. The competition rose from two main fields: 1) communicating with the other world and spirit-recalling and 2) saving lives from illnesses , especially epidemics. *Jiangui ren* usually acted as witness in the stories told by doctors , Buddhist monks and Daoist priests due to their ability to see ghosts.

The Origins of the Ding-zhong System of the Sui-Tang Dynasties

Xu Chang (p. 255)

The earliest record on the ding-zhong system (an age-based tax

system) from official historical documents was the household tax system (*hudiaoshi*)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Yet the most complete system—*huang-xiao-zhong-ding-lao* (黃小中丁老 infants under 3 years old , minors , semi-able-bodied people , fully able-bodied people , aged people) was considered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Sui Dynasty from the traditional point of view. By investigat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cords in D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in stream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from Jin to Sui-Tang laid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series of economic measures of North Zhou contained the reformation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aw and the *ding-zhong* system , which was passed down by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ynasty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

The Changes of Temple Name

“Taizu” of Tuoba Wei Dynasties

Wang Ming (p. 293)

During the North Wei Dynasty Emperor Pingwen and Emperor Daowu were both given the temple name of “Taizu” (Grand Progenitor) , which confused the scholars of Qing Dynasty. Actually , Emperor Pingwen’s temple name given by Emperor Daowu was “Taizu” , and the one of Emperor Daowu given by Emperor Mingyuan was “Liezu” (Heroic Progenitor) . At the age of Emperor Xiaowen , he removed Emperor Pingwen’s position from the imperial temple , and gave Emperor Daowu the honor of “Taizu”. Later , there were several changes of the temple name “Liezu” from the North Wei Dynasty to the later East Wei and West Wei Dynasties.